

毛泽东对“两个结合”的先行探索

刘 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党和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和方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框架,其中包含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中国历史文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子课题。这一理论框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下,如何用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这为新时代“两个结合”的提出准备了思想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两个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精华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31X(2023)04-0010-09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1][17]}“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向路径。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堪称“两个结合”的先行探索者。回顾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对于理解“两个结合”的基本要素、内在逻辑、实践路径具有参考价值。

一、毛泽东探索“两个结合”的思想条件和实践主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有适宜其

生长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相遇,必须翻译成中国语言文字,经过中国思想的阐释,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中宣传,才能被大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互理解、阐释、认同和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质、中国精神、中国形式。具有传统文化根底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力量。青年毛泽东比较各种社会思潮、选择马克思主义,也必然有深厚的文化条件、历史际遇和实践载体。

厚植中华文化的根基,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释的前提。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广泛涉猎传统文化典籍,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先秦诸子的著作、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等传统经典著作。1916年毛泽东为萧子升开列的国学书目中,有经类13种,史类16种,子类22种,集类26种,合77种,是志于学问而必读的书目。《体育之研究》是青

收稿日期:2023-05-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研究”(22BKS001)

作者简介:刘仓(1975—),男,河北滦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年毛泽东运用传统文化分析社会问题的代表作。中国文化对于青年毛泽东形成较进步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等具有滋养作用。如古代圣贤修齐治平的抱负,指引青年毛泽东志存高远;往圣先哲对大同小康的追求,促使他向往大同社会理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培育了他海纳百川、艰苦奋斗、锲而不舍、鞠躬尽瘁的精神品质;知信行合一的优良传统,造就了青年毛泽东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意志品格。掌握中国思想文化和历史智慧,是审视、评判和选择外来文化的思想条件。

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是对比中西文化的必要参照。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是青年毛泽东求学的理念。毛泽东阅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著作,对民主和专制有较明了的认知。他还涉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启蒙教育。他还阅读英法美俄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这对他“极有价值”。他还借阅过《世界英雄豪杰传》,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毛泽东详细批阅过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表达有关伦理、人生、道德、世界、历史、幸福等观念的认知,这是毛泽东对中西文化互释的有益探索。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是青年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间环节。

选择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前提。毛泽东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关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主张研究东西文明会合等社会问题,研究哲学、政治、社会等各种主义。他创办《湘江评论》,欢呼“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他经营文化书社,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使他致力于研究“阶级斗争”。他领导组织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只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他参与组建新民学会,后来倡导将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认为“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

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12]。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通过比较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激烈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温和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方法,表示最宜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这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13]。

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是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底。他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具有内圣外王的远大抱负。他追求大本大源,探索“宇宙之真理”。他赞同“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14]。他心怀救国安邦的志向,“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14]。他继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主张:“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14]他继承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传统,强调“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14]。这些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伦理观,是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根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这种结合的代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毛泽东把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中国文化相结合,探索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道理、道义。大革命时期,在反对军阀统治的同时,也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反对东方文化派、宗法社会旧教义,宣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社会观和集体主义人生观。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发布《对政局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将要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15]毛泽东撰写一系列著作,初步形成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毛泽东指导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主义和复古主义,反对党和军队中存在的封建残余思想,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和军队。政治革命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了实践主题。

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思考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其思想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具有优秀的组织能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但革命初期还不够成熟,党在大革命时期出现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时期出现“左”倾路线错误,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两次过严重失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回忆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的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6]299}不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实践相联系的;而成功的实践离不开成熟的思想理论的指引。

继承中华民族革命传统是增强抗战必胜精神的需要。抗日战争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要拯救民族危亡,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倡导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抵抗外来侵略的传统,崇尚民族英雄,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要求宣传抗战中的民族英雄及其事业,发扬为国家和民族而牺牲奋斗的精神,指明抗战必胜的前途;强调“利用中华民族过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迹与人物,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以击破投降妥协的心理”,要求“宣传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优秀分子的党,它继承着中华民族革命的传统,负担着解放民族与人民的历史使命”^{[7]700-701}。研究中国历史和弘扬民族精神,成为党领导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

革命战争实践要求党员干部加强科学理论和历史知识的学习。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8]533}为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国历史,学习中国文化,学习经济、政治和军事。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7]701}党

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干部教育运动、整风运动等,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革命方法,研究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算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明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延安时期,聚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具有较深传统文化素养的党的领导人,为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毛泽东撰写《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的成果。毛泽东还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问题》等,也是蕴含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代表作。毛泽东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刘少奇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绝不是只靠熟读、背诵马克思的著作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社会历史及其发展作出科学分析,需要对于无产阶级事业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忠心,需要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9]335-336}。

二、毛泽东构建“两个结合”的理论框架及其文化传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框架,其中包含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中国历史和

文化,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如何运用中国思想文化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原则,等等。

第一,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 and 理论原则。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实践中得到证明的科学理论。马恩列斯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能把它们当作教条看待,而是看作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10]264}。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同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534}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要求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1]814},在具体分析详细材料基础上引出理论性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有的放矢”,是箭和靶的关系。四是反对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教条主义的特点,是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照搬照抄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指导中国革命。经验主义是教条主义的帮手,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8]534}

第二,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科学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命题。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2]318-319}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命题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命题。前者注重革命实践,后者注重革命理论;前者是革命内容,后者是民族形式;前者是革命的本质,后者是对革命的认识;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为前者服务。毛泽东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13]344}

第三,运用中国历史文化阐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毛泽东阐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方向、前途和意义,都带有中华文化的特点。一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农民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到晚清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农民起义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8]625}由于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这种农民起义总是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状况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得以根本改变,中国民主革命实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二是运用传统文化典故阐释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38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讲话时,要求“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山统统移掉”^{[14]68}。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强调,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11]1102}。人民群众是搬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上帝。三是运用大同理想阐明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大同”思想较早见于《礼记·礼运》。毛泽东用世界大同来解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

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13]484}只有中国独立解放,才能参加世界大同运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人民的国家机器,使中国有可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5]1476}。四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文化复兴开辟道路。振兴中华,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追求。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15]1516}。

《论语·子路》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毛泽东借用这句话指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13]160-161}运用中国思想文化阐释中国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在规定。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中国思想文化相结合,也就无法被中国人民所接受,精神力量也无法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5]1515}

毛泽东许多著作都包含对中国文化的扬弃。在《毛泽东选集》中,许多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经书,《老子》《荀子》《管子》《韩非子》《列子》《孙子兵法》等著作,《左传》《国语》《史记》《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魏书》《晋书》《北史》《南史》《宋史》等史书,还有《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杂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昭明文选》《世说新语》《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说苑》等文学著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包含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农民解放、统一战线、革命战争、根据地、党的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与政策等,“是中国民族智慧的

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19]335}。这些理论和政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典型战争,创造性地阐述和运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就是这方面的理论代表作。面对抗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根据主观指导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的互相转化,总结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案例。他列举说,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是以少击多、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敌方丧失优势和主动地位,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8]491}。这从战略上指明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毛泽东还运用古代战争思想阐释中国革命战争理论。他借用“春秋无义战”问题,区别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强调“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10]161}。他吸取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思想,强调遵照战争规律,表示“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8]490}。这些都用中国历史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运用中国思想文化阐释党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论。运用传统文化说明统一战线的意义,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借用《封神演义》中申公豹的例子,表示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引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寓言,警告国民党顽固派不要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摩擦。面对国民党的两手政策,毛泽东借用朱熹的名言,“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调“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8]782}。面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危险,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引用“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等古语,表示“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6]326},阐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他强调“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16]389}。

运用中国思想文化阐释党的建设问题。在宗旨方面,通过改造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强调“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11]1004},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政治建设方面,运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浩然正气,阐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思想建设方面,借用《孟子》中“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表达通过修养可以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如果自暴自弃则会变成不可雕琢的“朽木”。在作风建设方面,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共产党的思想和肌体的有效方法^{[11]1096}。

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中华民族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捍卫中华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文化。改造中国传统道德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1939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的“共同目标”,即“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号召“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判断忠孝的唯一标准,在于是否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17]181、183}。这就将中国传统道德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9]333}。毛泽东思想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

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19]334}。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曾说,毛泽东“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18]98}。

三、毛泽东探索“第二次结合”的方向和“继承文化遗产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

第一,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326}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6]5}坚持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创造新的理论。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6]109}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没有新理论,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前进。

第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命题。一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1956

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20]23-24}。这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根本方向。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121]78}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学说、十大关系、中国工业化道路、价值规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二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原则方向。普遍真理,各民族都是适用的,但在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121]78}

三是提出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毛泽东说:“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121]78}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西洋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是中国的特点要保存。“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121]82}周恩来提出“文化融合说”,主张把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122]344}。

第三,丰富和发展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时,阐释了如何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一是运用阶级分析法判断传统文化的性质和规律。中国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也有反封建的文化。“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

东西区别开来”,批判地加以利用,“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6]225}。二是运用辩证分析法搞清楚中国文化的好坏优劣。封建主义文化也不全是腐朽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全是进步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三是运用历史主义方法考察封建时代的文化。毛泽东指出:“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6]225}四是运用价值分析法评判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毛泽东说:“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6]225}周恩来也主张保存文物和民族文化遗产,强调“我们要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就要把我们的文化发扬光大,对全人类的文化有所贡献”^{[123]331}。

第四,处理好对待传统文化的若干关系。一是处理好精华和糟粕的关系。传统文化中有精华和糟粕、香花和毒草;但是糟粕和毒草也并非全无价值。“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121]257}二是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以及当归、大黄等中药,这些没有什么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121]77}三是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121]81}四是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地主和农民都有文化,精工细作、唱歌跳舞也是文化。资产阶级有近代文化技术,需要团结他们为工人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五是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人民解放军的军乐队不能用唢呐、胡琴,军装不能胸前背后都写着“勇”字;要从形式和内容上创造新的民族文化。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参考了清末“十九信条”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六是处理好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有民族特性,可以国际化。演奏西方音乐并没有使民乐衰落,反而继续发展。“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

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21]83}毛泽东对这些关系问题的思考,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第五,运用中国文化来阐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运用中国文化来阐释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比如借用《礼记·大同篇》《桃花源记》《大同书》《张鲁传》等,说明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的文化底蕴。用“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阐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继承、改造和弘扬“施仁政”的理念,“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24]988}。借用韩愈的《送穷文》,表达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仿效陆游《示儿》作诗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21]459},表示将社会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和精神。通过编辑《不怕鬼的故事》,表达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反抗精神;通过“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以诗言志,表达无产阶级的斗志。借鉴中国历史经验,加强领导干部的修养,也是毛泽东弘扬传统文化的重点。比如通过阅读李延寿《南史》中《韦睿传》,要求“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通过推荐《郭嘉传》,启发领导干部“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要多谋善断;通过廉颇和蔺相如的将相和的故事,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团结;通过霸王别姬的典故,警示干部要发扬民主集中制;通过《三打祝家庄》的例子,说明“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矛盾”,强调要搞调查研究,等等。这些思考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和尝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事业取得显著进展,也积累了深刻教训。由于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在政治思想革命的语境下,还没有从国家发展大局中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20世纪80年代,如何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也是诸多学者思考的重大问题。钱学森认为:“一是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立国之本’。”^[25]钱学森在阅读了张岱年的《文化与哲学》后,向张岱年提议,要把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精华提炼出来,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张岱年同意这个建议。1989年12月28日,钱学森在致胡孚琛的信中表示“能不能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用来丰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结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我民族的优秀智慧加以充实和扩展”,并说“此建议是件大事”^{[26]28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历史进程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地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运用中华优秀思想阐释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都强调了坚持“两个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任务,体现了对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接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8]斯图尔特·施拉姆著,田松年,杨德等译.毛泽东的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1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0]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2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2]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文化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编辑部.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N].光明日报,2009-12-01(002).
- [26]张现民.钱学森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Mao Zedong's Pioneering Exploration of "Two Combinations"

LIU Ca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Mao Zedong is a great pioneer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Mao Zedong establish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direction of combining Marxism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culture, which reflect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and cultur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cludes sub topics such as how to treat Marxism, how to treat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how to use Marxism to guid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how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Marxism.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uphel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how to enrich and develop Marxism with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the times, which has prepared the ideological conditions for the proposal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Mao Zedong Thought; "two combinations";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责任编辑:胡慧娥]